

文艺学系列教材



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龚举善 著



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龚举善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从新时期到新世纪/龚举善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622-5147-7

I. ①报… II. ①龚… III. ①报告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8919 号

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 龚举善 著

责任编辑:杜李娟 刘晓嘉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新视点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250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3.25

版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24.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引 言 20 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三次浪潮	(1)
一、20 世纪 30 年代的救亡型报告文学	(1)
二、20 世纪 50 年代的建设型报告文学	(5)
三、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型报告文学	(8)
第一章 报告文学：文体必要与现代资质	(11)
第一节 报告文学的趋同性和异质性	(11)
第二节 转型期报告文学的现代特质	(23)
第二章 转进路线：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37)
第一节 《哥德巴赫猜想》的开启意义	(37)
第二节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的突进与调适	(43)
第三节 新世纪十年的开掘姿态	(52)
第三章 文化身份：文化生成与身份位移	(61)
第一节 文化生成：三重参照	(61)
第二节 身份位移：原因与启示	(69)
第四章 主题样态：以改革为基调的多元模式	(78)
第一节 改革是转型期报告文学的总体基调	(78)
第二节 救赎是转型期报告文学的主体愿景	(80)
第三节 几种代表性主题模式	(85)

第五章 题材范型：以民本为元素的多向展开	(90)
第一节 不倦的话题：“三农”题材	(90)
第二节 沉重的应对：生态诉求	(97)
第三节 渴望的目光：教育关怀	(109)
第四节 艰辛的抵抗：反腐意志	(115)
第六章 文体格调：现代品格与艺术维度	(131)
第一节 现代文学品格	(131)
第二节 多元艺术维度	(143)
第七章 转进指向：日趋自觉的发展理路	(165)
第一节 批判理路：由“审父”到自审	(165)
第二节 参与理路：由边缘到中心	(169)
第三节 叙事理路：由聚焦到散点	(171)
第四节 传播理路：由一元到多维	(175)
第八章 回顾与前瞻：挑战中的希望	(180)
第一节 挑战：不应忽视的问题	(180)
第二节 希望：新世纪可能的机遇	(189)
主要参考文献	(195)
后 记	(205)

引言 20 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三次浪潮

中国报告文学已经走过了整整 100 年坎坷而辉煌的历程,它以何种姿态迎候新世纪,这是每一位报告文学的关心者不得不正视并予以回答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在基本完成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的转型并已开始知识文化建构的世纪当口,百年来丰厚的报告文学实践及足够的审读时距,为我们准确而宏观地切入审视对象提供了最佳契机。

中国报告文学受孕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脱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应和着科学与民主的呼声,《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等作品应运而生。1920 年初,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先后问世,首开我国异域题材报告文学之先河。1921 年—1924 年,周恩来旅欧期间,陆续撰成 30 余万言的“旅欧通信”,相继刊于天津《益世报》,作者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实践者。1925 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沈雁冰、叶圣陶、西谛等接连发表了《五月卅日的下午》、《暴风雨》、《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街血洗去后》等作品。随后,陆定一的《五卅节的上海》、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作品引起了人们更为广泛而强烈的关注。

1930 年,“左联”正式引进“报告文学”概念,并发出“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的总动员令。以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为标志,中国报告文学创作驶入文体自觉的轨道。总体上来看,20 世纪的中国报告文学受制于三大社会历史语境,即军事政治语境、政治经济语境和知识文化语境。承此,20 世纪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掀起了三次声势浩大的浪潮,并相应地聚合为三种范型:20 世纪 30 年代的救亡型报告文学,20 世纪 50 年代的建设型报告文学,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型报告文学。

一、20 世纪 30 年代的救亡型报告文学

社会的剧变和民族的苦难,常常是报告文学得以勃兴的源头活水。1931 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华野心败露。但蒋介石政府忙于反共,对日妥协,不到五年时间,东北三省、热河、察北、冀东等地连落敌手。值此“救亡压倒启蒙”的生死存亡关头,大批热血作家和爱国志士纷纷挥毫上阵,写下了一篇篇感人肺腑的报告文学作品,为警示国人、激励抗战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完全可以认为,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并波及40年代的第一次报告文学浪潮,以争取民族独立为潮头,客观上充当了全民抗战政治语境的文学“利器”。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称淞沪抗战或上海事变。同年4月,阿英从反映该事变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精选出28篇,结集为《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以南强编辑部名义出版。这是我国公认的第一部报告文学专集。随后,《文艺新闻》编辑部推出《上海的烽火》,成为前者的姊妹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和《上海的烽火》的相继面世,带动了一大批“事变报告文学”创作,并为30年代的救亡报告文学写作提供了成功经验。

1936年在20世纪3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中国报告文学名副其实的丰收年。其中,宋之的创作的《1936年春在太原》通过颁发“好人证”等事,辛辣地嘲讽了山西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防共”丑行。夏衍于《光明》创刊号上推出了里程碑式的作品——《包身工》。该作塑造了“芦柴棒”的典型形象,真实、生动而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酷盘剥,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由产生步入成熟的重要标志。周立波当时评价:“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情真意挚的报告文学。在报告文学刚刚萌芽,工人文学非常缺乏的现在,它有双重的巨大意义。”^①

与此同时,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作品得以发表,它们以游记体形式丰富了报告文学的表现范围和话语方式。尤其是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以其探险意识和求真精神确立了报告文学的一代风范,数月之内连版七次。一位读者这样对他说:“我读了你的一切通讯,发现了中华民族的许多问题。正如读了易卜生的戏剧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许多问题。”^②应该说,这是对范长江报告文学创作所作的最高也是最好的评价。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间掀起了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群众性报告文学运动。一是全面反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报告文学热潮,二是受高尔基编

① 转引自赵遐秋:《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

② 龚举善:《走过世纪门》,红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辑《世界的一日》动议的启发,由茅盾主编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国的一日》的出版。尤其是后者,在征文通知发出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收稿 3000 余篇。后经编委会审定,采用其中的 498 篇,总计 80 万字。茅盾在《关于编辑的经过》一文中指出:“这里是什么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后麻木的阶层,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员的腐化,土劣的横暴,女性的被压迫,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彷徨,‘受难者’的痛苦及其精神上的不屈服……”^①关于作品的重大社会职能,黎烈文认为:“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中国究竟破碎到了怎样的地步?这老大民族有没有复兴的希望。”^②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中国救亡型报告文学进入空前繁荣阶段。《上海一日》和《战斗的素描》堪称表率。

1937 年底,上海沦陷。因英、法等外国租界的特殊身份,上海得以以“孤岛”身份暂时维持“中立国”形象。广大敌占区作家利用“孤岛”坚守写作,并于 1938 年发起规模化征文活动,仿效《中国的一日》辑成《上海一日》。该集收录报告文学 432 篇,计 100 万字。主编梅益称之为描写“上海军民的战斗和生活的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画卷”。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以群又选编了抗战报告文学专集《战斗的素描》。在论及编辑动因时,他指出抗战报告文学“永远和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抗日斗争密切地结合着。它是从民众反日抗日运动的土壤上产生,吮吸着抗日斗争的乳浆而成长起来的”^③。因而,在如火如荼地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时代,“报告文学填充了一切杂志或报纸的文艺篇幅: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报告文学的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报告文学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④可见,是火热的抗战生活挑选了报告文学。

在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救亡型报告文学的潮响中,几位域外作家以其深沉的人类

① 茅盾:《关于编辑的经过》,见王荣纲编:《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下),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67 页。

② 黎烈文:《略谈〈中国的一日〉》,载《中流》,第 1 卷第 3 期。

③ 以群:《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见王荣纲编:《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下),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77 页。

④ 以群:《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见王荣纲编:《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下),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82 页。

关怀、独特的观察角度和具有国际声誉的写文本使此期报告文学的“合唱”趋向多声部。代表性作家有：基希、史沫特莱和斯诺夫妇。

基希是捷克籍新闻记者和杰出的国际报告文学大师。1932年他来到中国，会见了鲁迅，深入考察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异常深刻地报告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写成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周立波认为，直到基希的作品出来，“报告才成为一种不能被人轻视的独特的新形式”。黄钢回忆说，1938年延安鲁艺文工团的团员们奔赴晋东南前线时，简单的行军背包中都背着手抄本《秘密的中国》。

史沫特莱于1929年—1941年生活在中国，先后写出了《中国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反攻》、《中国的战歌》以及后来发表的《伟大的道路》等报告文学作品。她是一位率真而执着的女性。法国的皮埃尔·梅林评价说：“在现代作家中，像她那样的，怀着明白的责任观念，将人类的痛苦，以及受着本国和外国的统治阶级的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灾难，描写了出来者，是不多的。”^①史沫特莱正是这样几位不多的作家之一。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专家尹均生先生盛赞“史沫特莱以其毕生精力写出的《伟大的道路》是世界纪实文学的一座丰碑”^②。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斯诺夫妇关于中国的一系列深度报告，构成了这一时期报告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特别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海伦·福斯特的《续西行漫记》的相继出版，将30年代救亡报告文学的浪潮推向了新的高度。它们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是20世纪国际报告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西行漫记》的全球性畅销，第一次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事业光耀天下，斯诺本人也与作品一起成为“20世纪永恒的红星”。就作品产生的巨大社会历史作用和现实魅力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年代，在那个中国人民需要理解和帮助、世界呼唤沟通和交流的年代，斯诺等国际友人‘信奉并从事的沟通和交流事业，开阔了思想，减少了疑虑，增进了了解，促进了合作’。作为这种沟通和交流事业的结晶，《西行漫记》实现了多方面的价值对位，并将引导人们在开辟人类新前景方面继续发挥作用”^③。

上述国际友人真实而富有文学深度的报告，不仅客观公正地报道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解放壮举，而且极大地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有效地争取了世界爱好和平与进步的人民对于中国反帝运动的同情与支持。

① [法]皮埃尔·梅林：《报告文学论》，译文原载《文学界》，1936年创刊号。

② 尹均生：《国际报告文学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页。

③ 龚举善、尹均生：《〈西行漫记〉的人类学意识》，见《二十世纪永恒的红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除此之外,较有影响的抗战救亡报告文学集还有:《红军长征记》、《五月的延安》、《陕公生活》、《冀中一日》、《伟大的一年间》、《伟大的两年间》、《冀中抗战八年》等。这些作品,以红军长征和解放区生活为切入点,多层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丰功伟绩。

事实上,救亡型报告文学始终伴随着抗日运动的全过程。日本投降不久,中国便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其间,涌现出不少优秀报告文学作品。除众多单篇作品外,《环行东北》、《光明照耀着沈阳》、《为祖国而战》、《渡江一日》、《英雄的十月》等报告文学集尤为引人注目。它们是 30 年代救亡型报告文学的逻辑延伸,也是迎候新中国诞生的第一批报春鸟。

二、20 世纪 50 年代的建设型报告文学

194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一声礼炮,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报告文学随之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是谓 20 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第二次浪潮。

1949 年 7 月 2 日,在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成立了中华全国艺术界联合会,推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随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宣告成立(即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茅盾当选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由此,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开始走向复兴之路。

根据首届文代会出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决定,全部 53 种丛书中就有 7 部报告文学集,包括周而复、华山、刘白羽、韩希梁等人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与此同时,香港进步文艺团体组编了一套“文艺生活选集”,司马文森任《报告文学选》主编。他在序言中说:“让我们向旧日的苦难日子告别,更坚决更勇敢地迎接未来!”上述报告文学选集,既是我国第一次报告文学浪潮的总结,也是第二次报告文学浪潮的开端,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1950 年 6 月,美国入侵朝鲜,朝鲜战争爆发。很快,战火迫近中朝边境,严重威胁到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同年 10 月,我国组成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一道并肩作战,共同谱写了抗美援朝的壮丽乐章。魏巍、刘白羽、黄钢、华山、杨朔、陆柱国、韩希梁、田流、巴金、靳以等大批作家深入火线,热烈而生动地报告了这一人间义举。后来,主要作品以集体成果《朝鲜通讯报告选》、《志愿军

英雄传》、《志愿军一日》等形式出版,掀起了一股“抗美援朝报告文学热”,强化了第二次报告文学浪潮的高亢基调。其中,巍巍于1950年、1952年、1958年三入朝鲜,共写出17篇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后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名结集出版,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一度使“最可爱的人”誉满华夏。

不过,真正代表5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主流的还是建设型报告文学。经数年积蓄,至1955年前后,先后出版了全面反映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生活的多种报告文学选集。影响较大的有:《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技术革新通讯报告选集》、《肃奸反特通讯报告选》、《解放军通讯报告选集》、《散文特写选》等。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进入高潮。社会的发展刺激了文化的繁荣,毛泽东同志适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和文艺发展方针。在现实生活与意识形态的双重鼓励下,作家们热衷于报告文学的深度探索,报告文学随之跃上新台阶。

刘宾雁率先发表《在桥梁工地上》,为新兴建设型报告文学提供了光辉范例。该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后又一个报告文学经典。作品以敏锐的理性眼光、深沉的批判意识和犀利的文字表达,深刻地抨击了以桥梁队长罗立正为代表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文章发表后争相传阅、交口称赞,堪称恢复报告文学文化身份的力作,充分代表了5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高度。

接下来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相当程度上损伤了报告文学的元气。刘宾雁、柳溪等被打成右派,荔青的《马端的堕落》、白危的《被危困的农庄主席》等揭露性作品遭到批判。姚文元在《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一文中叫嚣:“前一个时期,从刘宾雁的特写开始,我们的文学界逐渐滋长着一种‘揭阴暗面’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站在敌视社会主义立场上提出问题来的。”^①此论一出,殃及众多无辜作家,“一大批对革命文艺有过贡献的新老作家横遭打击,其中包括对中国报告文学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丁玲、萧乾、姚雪垠、秦兆阳、陈学昭、刘盛亚、彭子冈、白朗、罗烽等等,他们被剥夺创作权利21年之久,给中国的文学事业、包括报告文学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②。

在50年代报告文学的波翻浪滚中,1958年具有“波峰”性质。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就与不足,与此同时得到了充分展现。在“大跃进”背景之下,中国作家协会于1958年

① 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见龚举善:《走过世纪门》,红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② 龚举善:《走过世纪门》,红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3月提出了文学工作的“跃进规划”，《人民日报》、《文艺报》争相发表社论，为文艺跃进摇旗呐喊。1958年第20期《文艺报》特别发表专论《大搞报告文学》，并开辟“大家写报告文学”专栏，号召“全国各地在大搞创作规划的时候，希望大家更多地注意报告文学。把生活中最尖锐的东西通过报告文学这个最尖锐的体裁充分反映出来吧！”^①鼓动之下，成百上千的作家走进生活，纷纷“报告”火热的大时代建设景象。截至1959年，计出《大跃进丛刊》、《钢铁前线的日日夜夜》、《炉火熊熊》、《农村大跃进之歌》、《社会主义红花遍地开》、《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建设十三陵水库的人们》、《创造奇迹的时代》、《时代新人》、《诗人歌手数今朝》、《跃进的先锋》、《大跃进的标兵》、《大跃进的一天》、《上海大跃进的一日》等上百种报告文学专辑，真正出现了“报告”大爆炸的文学景观。

应该承认，此期的报告文学写作取材广泛、数量众多、影响空前，也确实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如雷加的《三门峡截流小记》、华山的《神河断流》、巴金的《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慕水源的《冰峰五姑娘》、魏钢焰的《宝地宝人宝事》以及刘白羽的《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万炮震金门》等。但受“大跃进”浮夸风的深刻影响，“虚假报告”大量充斥文坛。《总路线照耀下的道口乡》吹嘘该乡“六天建成243个工厂”，《平原上的火炬》谎称“五天建成一个水电站”。更有甚者，《小麦的红旗》写“小麦平均亩产3200斤”，“兔子见了人往这块麦地里一钻，被麦秆撞了回来，又往上一跳，被麦秆子架住了。……据说有的社员在这块麦地里还捉住两只兔子，因为兔子被麦秆夹住跑不动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初出版的报告文学集《一代新人》中，有一篇《千锤百炼的“铁姑娘”》，记载寿阳县出了五位“铁姑娘”。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她们喊出“乘卫星，驾火箭，大胆想，冲天干，平均每亩收八万，高额丰产双十万，决心沙滩创奇迹，世界小麦称第一”的口号。作品写道：“她们种的谷子、玉米、大豆亩产都在一万斤以上，其中一亩一分大豆创造了全县最高纪录，亩产达一万六千七百四十一斤四两，二亩晚玉米亩产达到一万四千七百多斤。”由此可见，浮夸风在当时的报告文学界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表明，报告文学确实较其他文体更为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神经”，包括时代的病态。

到了1960年，因天灾人祸，共和国面临大饥荒。中共中央开始着手纠正“左”的错误，文艺政策得到调整。总体上看，60年代初的报告文学相对健康，它们以反拨50年代末浮夸文风的面目出现，本质上是第二次报告文学浪潮的组成部分。其中，王磊、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西虹的《南京路上好八连》、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

① 转引自张春宁：《中国报告文学史稿》，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页。

福》、徐迟的《祁连山下》、茹志鹃的《在那东海边上》、王西彦的《富饶的花果山》、碧野的《黄连架》、东生的《看愚公怎样移山》、骆宾基的《春天的报告》、郭小川的《旱天不旱地》、孙谦的《大寨英雄谱》、甄为民等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魏钢焰的《红桃是怎样开的》等，都真实而艺术地表现了城乡各条战线上的建设英雄及其建设事业。黄宗英自1963年起连续推出《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新洋伯》等，为报告文学创作添加一股清新的气息。穆青等集体创作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则被认为是此期“榜样文学”的压卷之作，唱出了和平建设时期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同样不能忘记，1963年3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邀约30余位作家、理论家聚会北京，召开了我国首次报告文学专题座谈会，就报告文学的概念、真实性、时代精神以及报告文学的题材、风格等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探讨。不久之后，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了三卷本《报告文学选》，人民日报出版社发行了《春天的报告》，解放军文艺社推出了《部队报告文学散文选》。它们以集束方式为第二次报告文学浪潮推波助澜。

概而言之，第二次报告文学浪潮发端于50年代初期，延伸到60年代中期。它以“三大主义”为基调（即取材上的建设主义，人物上的英雄主义，主题上的“歌德主义”），弹奏出复兴时代波澜壮阔的建设交响乐。同时，它的成功与失误都给报告文学的历史留下了耐人寻味的阐释空间，其足够的启示价值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牢固而特殊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大跃进”在内的50年代建设型报告文学的文学史地位或许高于文本自身的创新意义。

三、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型报告文学

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几乎成了“没有文学的时代”。尽管有少量报告文学问世，但也与其他文体一样在夹缝中求生。

报告文学在寻找中等待。

1978年5月，《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相继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新时期的春潮开始涌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明确打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1979年10月，中国第四次全国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同志欣然致

辞。他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时期,“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①。新时期文艺的春天来到了。

时代又一次选择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以挑战者的姿态拥抱着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报告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它常常充当着新时代文学的“启动盘”。中国新时期文坛也不例外。早在1977年,徐迟、刘白羽、魏钢焰、黄宗英等就已经开始以报告文学的方式为新时期放声歌唱。徐迟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率先报告了新时期科学与文艺春天的信息。作者曾意味深长地说:“这时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②由此,一大批以科技工作者、知识分子为主角的报告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灿烂逼人。继徐迟的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之后,197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科学的春天》、《亚洲大陆的新崛起》、《高山与平原》。随后,一批历史与现实反思型报告文学以其强劲势头攻占文坛主战场,如《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急风暴雨中》、《正气歌》、《划破夜幕的陨星》、《命运》、《线》、《九·一三事件始末记》、《一个人和他的影子》、《大雁情》、《痴情》等。

与此同时,改革颂歌与反腐“文告”成为这一时期报告文学正反相成的主流景观。《这里有十万颗火热的心》、《励精图治》、《热流》、《艰难的起飞》、《一个“精灵”的出现》、《绝非虚构的乐园》以及《人妖之间》、《一枕铜官梦》、《“渤海二号”事故调查纪实》等作品,将80年代改革型报告文学托举到一个新的境界。

报告文学在思想解放之后快速觉醒和迅猛发展,很快成为新时期文坛的“优势兴奋中心”。1979年6月,31所(家)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会集江城,在武汉师范学院召开了新时期以来的第一次大型报告文学研讨会,全方位检讨了报告文学的理论定位与实践形态,最终彻底地将报告文学从文体的混沌与摇摆之中解脱出来。

总体来说,新时期报告文学作者云集,题材广阔,视角多变,手法灵活,多有佳作。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曾特别指出:“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

①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211页。

② 徐迟:《为什么写?怎样写?》,载《江苏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①

如果说 80 年代的报告文学达到火爆的巅峰状态的话,那么 90 年代的报告文学则在沉静中走向成熟,并以此丰富了第三次报告文学浪潮的表现形态和冲击力量。理论界已经确认,“进入 90 年代之后,面对日益深入改革开放而裸露出质核的社会,报告文学更是自觉地融入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思维、知识和手段,来表现改革年代政治、经济、法制等各个领域中的新旧观念的冲突”^②。我们也注意到,转型期的报告文学回眸意识加浓,热点追踪及透视效果明显,哲理性增强,更为注重批判意识和人文底蕴,并且不乏全球视野。就代表性作品而言,主要呈六种态势:一是历史反思性报告文学的空前走俏;二是时事追踪性报告文学的全面勃兴;三是高科技题材报告文学的强势运作;四是道德与法律审视性报告文学的深度开掘;五是文化关怀性报告文学对知识文明的着意保留;六是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而出现的生态忧患性报告文学大出风头。对此,我们将在后面的相关章节予以阐述,这里不再详加罗列。

当我们循着中国报告文学的涛声抵达 21 世纪的闸门时,发现 20 世纪已如流星般从头顶划过。回放中国报告文学的三次浪潮,发现它们是如此紧密地与时代黏合在一起,始终站在生活的前沿,勇立潮头挽大风,并且正在开辟着越来越宽广的文体生存道路。这种日渐宽广的报告文学生存之路体现为四大演进趋势,即取材上的多样化趋势,题旨上的理性化趋势,手法上的多元化趋势,传播上的电子化趋势。上述趋势孕育着报告文学的现代文化品格,这种品格以变动、开放、多元为根本特征。明智的报告文学作家自然应该主动向这种品格靠拢。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创造出紧跟时代潮流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因为“如果认定自己处在一个固定的世界中,我们就会抗拒改变;但若坚信这是一个流变的世界,我们就会与变动携手前进”^③。

① 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2 页。

② 李阳春:《由“聚焦”走向“广角”的报告文学》,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5 期。

③ 参见《对当前现实主义新写作现象的看法》,载《光明日报》,1997 年 5 月 13 日。

第一章 报告文学：文体必要与现代资质

报告文学是伴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①和近代报刊业的兴起^②而诞生的一种新兴非虚构文学样式，是一种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交叉性边缘文体。按照“世纪”划分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虽然视野宏阔，但不一定就是文学研究的唯一选择，自然也不是报告文学研究的最佳方法。事实上，文学的发展常常具有“跨时空沟通”的特征。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选取转型期 32 年（1978—2010）间的报告文学区段作为理论考量的对象，以期探究中国报告文学在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这一转型与推进过程中的传承和转进规律。

第一节 报告文学的趋同性和异质性

报告文学自身成长中的两大基本规律——趋同性本质与异质性选择，是报告文学最起码的文体特性。趋同（convergence），指若干不同事物走向相同的发展方向。趋同性，亦即向着同一方向发展的属性，一般指不同事物或事物集群在不断演进过程中所逐渐表现出的相似形态或共同特征。异质（heterogen），原意为异基因，通常延伸为异类或异族。异质性，简单来说就是异类性或差异性。报告文学的趋同性主要是指该文体在长期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所凝聚、积淀下来的较为恒常的具有内在规定性和形制普

① 1819 年，英国人玛利逊首次用汉字活字印成《圣经》。此后，经多年的实践与改进，英国商人美查于 1872 年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份商业报纸《申报》。1897 年和 1912 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先后成立，机械化现代印刷技术开始成为主流。

② 世界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是 1815 年 8 月 5 日由英国传教士米怜主编的宗教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该刊内容广涉基督教义、伦理道德、天文地理和时政概览等，不仅创造了“孔孟加耶稣”的宣传模式，而且刊发了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预告性新闻《月蚀》、最早的广告《告贴》和最早的新闻图画《事逗娘娘悬人环运图》。

适性的根本特质,而报告文学的异质性则突出强调不同的社会事物和主体趣味给该文体写作、呈现、传播与接受行为所带来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一、报告文学的趋同性

报告文学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现实内容的客观性、主体思想的批判性、文本彰显的透明性三个基本层面。

1. 现实内容的客观性

现实内容的客观性亦即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通常内含三大指标:一是对对象的现实性,二是内容的真实性,三是呈现的客观性。

“非虚构”是与虚构相对应的基于真实性考量的一种生活判断,它更多地指向事实性存在,后来也借以指称意识范畴或精神现象中的可信成分或真实感受,也有人干脆称之为“纪实”。实际上,纪实既是一种与想象相形而在的价值认同,也是一种重要的写作原则。在纪实原则之下写出的既可以是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也可以是游记文学、狭义的散文甚至是诗歌或小说。作为文体的报告文学不仅强调非虚构性,而且高度关注写作方式的现实性和问题性。报告文学之所以常常与“非虚构”或“纪实”扯上关系,主要是因为它是纪实原则规约下的一种具有非虚构性的文学体式。

所谓“对象的现实性”,即作者在特定的报告文学创作过程中所框定的生活素材必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最好选取那些直接影响当下生活并具有普遍而深刻社会意义的现在进行时态的事件作为创作题材。提出这样的要求,既是报告文学新闻性、报告性特征的内在规定,也是现代读者对该文体合法性的必要施加。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报告文学,某些历史题材特别是那些距今久远、已不具备采访当事人条件的“写作对象”显然不适合报告文学的写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熙乾隆之类的历史陈迹确实不便甚至无法予以真切地报告了,因为它们已经不能保证报告文学写作的现场感和时效性,自然也就很难保障报告文学非虚构性的有效实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提倡严格区分报告文学和历史小说的写作界限。

关于“内容的真实性”,除必须在文本中表达真实的观念、情感外(尽管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们在此特别强调作家对社会生活本来面相和自身逻辑的高度尊重,即必须秉持非虚构的认知、选择、提炼、整合与展现原则。这意味着报告文学作家不仅不能虚构现实、篡改生活,而且不应遮蔽现实、修饰生活,甚至不可删繁就简、避重就轻、刻意躲闪现实矛盾。基希之所以称报告文学是“危险的文学样式”,人们之所以呼吁作家应有勇气与担当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报告文学真实内容的基本估量和真诚向往。王宏甲说得好:“要想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都非常困难,还有多大兴趣去